

决策参考

Jue ce can kao

第六十七期（总第 317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9 年 5 月 31 日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5月26日至27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重点项目推进工作和“双过半”动员会议,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工作会议精神,结合盐城实际,研究部署如何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以进位争先的精神状态奋力冲刺“双过半”,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应对源于西方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拯救经济方案。其中很大部分会用于十大产业的振兴。不可否认,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各大产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产业带来了严重负面的影响,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调整结构和产业升级。本期推出“金融危机与产业升级”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当然,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高层论坛”上发出的声音和深圳改革的新闻同样值得关注。

要目

●本期专题/金融危机与产业升级

郑永年:金融危机和中国产业升级

李毅中:六举措推动产业升级仍处最困难时期

丁磊养猪开产业升级新路

●八面来风

五大城市圈价值报告:深圳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居首

长三角打响海归人才争夺战

深圳将启动“行政权三分” 逐步取消区级政府

●高层论坛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仍应对经济前景保持谨慎

周其仁: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决定经济增长

●本期专题：金融危机与产业升级

郑永年：金融危机和中国产业升级

为应对源于西方的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出台了 4 万亿拯救经济方案。其中很大部分会用于十大产业的振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各大产业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产业带来了严重负面的影响。政府在这方面进行干预最也正常不过了。

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振兴”？振兴不应当被理解成为政府帮助这些产业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它们“恢复”到从前的水平，或者“维持”在现在的水平。如果那样，这些产业只会从政府那里“寻租”，千方百计从政府那里得到尽量多的财政和金融支持。结果，有可能导致政府对这些产业的过度信贷，而成为内部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这方面，中国过去有太多的经验教训了。

中央政府因此要把握庞大的 4 万亿或者以后更多的钱用在哪儿的问题。用不好，不但促成不了产业的进步，反而导致极大的腐败。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担心地方政府会利用这次金融危机大搞一些“形象工程”，并称之为“腐败”。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发生在产业振兴方面，只不过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从很大程度上说，金融危机确实是中国产业升级的一个机会。因为中国本身没有金融危机，只是受到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说，中国政府和企业仍然具有很强大的经济实力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但是，仅仅是应对危机远远不够。最为重要的是要思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的经济增长来源和产业所要面临的新的经济竞争环境。西方很多大型企业深受这次金融危机影响，但是这些企业并没有在那里等待死亡。实际上，各类企业也在利用这次危机来进行重组，从而抛掉过去沉重的包袱，再轻装上阵。

可以确切地说，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各产业必然面临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竞争环境。因此，政府的目标不仅仅是消化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是利用这次危机进行产业升级，让企业的各方面有个飞跃。

如何“腾笼换鸟”

在所有国家，产业升级是个非常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在亚洲，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很多时间来进行产业升级，一些经济体的升级显然要比另外一些经济体成功。同时也要看到，产业升级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面临的并非产业升级，而是产业扩张。也就是中国所说

的产业的“粗放型”的发展。最近几年，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地区就面临产业升级的挑战。这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珠江三角洲产业发展在很长时间里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自八十年代开始，地方有关部门对本身的产业发展没有长远的政策，只要是外资就受到欢迎。因此，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色。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显出其不可持续的特点。例如，它不能承受劳动关系的变化。前些年，中国出台新的劳动法，珠江三角洲的资本方反弹就很厉害。这种方式也不能承受土地方面的变化。当土地的供应不能持续时，这种发展模式也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在近年来开始努力调整产业政策。

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广东政府已经开始作产业的升级调整。广东的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关闭或者倒闭。广东称这一步是“腾笼换鸟”。这种做法受到一些方面的质疑，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但是，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一步必须走。事实上，广东政府也可以把金融危机看成是一个机会，因为它加速了“腾笼”的过程。

关键在于如何“换鸟”？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当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里首先必须对“换鸟”作合理的理解。很多人把它单纯理解成为“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子产品”。把落后的产业转移出去，把先进的产业请进来，这是一种产品产业的升级。但在同一个产业甚至同一种产品链上往上爬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升级。比如说，生产一双鞋，可以盈利 10 元，也可以盈利 100 元，就是说要从附加值方面考虑产业的升级。

不轻言放弃任何产业

古典和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强调的利用“比较优势”所进行的产业升级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问题。典型的就是英国。英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但到今天，其大部分产业已经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次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表现出极其脆弱性。因为今天的英国只有金融、教育等服务业和少量的技术产业。而这样的服务是需要全球性顾客的。从这个角度上看，英国经济现在高度依赖海外，显现出依附性经济体的特质。

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英国社会也受到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的痛苦。制造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学意义，而且具有社会学意义，因为制造业是最能够吸收劳动力的地方。制造业转移出去之后，就业就成为大问题。尽管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能够保障人民的体面生活，但一旦没有了工作机会，很多人无所事事，民风下降，给人一个文明倒退的感觉。不管怎样，近代文明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

正因为这样，即使西方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等，都不会轻言放弃任何一个产业。

这次金融危机也显示，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制造业）基础的国家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远没有那些制造业被大量转移出去的国家严重。这一点对中国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不仅能够容纳不同的产业，而且也容纳同一产业链上具有不同程度附加值的产品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劳动力大军充足的国家，尤其不应当轻言放弃任何产业。如果要作产业转移，那就应当在政府政策配合下在不同区域间（一个省内的不同区域或者不同省份之间）进行转移。

企业“走出去”的战略

产业升级是国际环境下的升级。如何升级？这些年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尤其在企业“走出去”方面。“走出去”不仅仅是国际化战略，更应当是产业升级战略。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具有政策意义：

第一是购买美国国债的问题。有人很形象地指出，中国应当购买的是美国产品，而非美国政府，就是说，要购买美国的技术、管理经验、知识等产品，而非美国政府债券。从中国政府对美国债券表现出来的担忧来看，购买美国产品显然要比购买美国政府更可靠，更具有价值。

第二是购买什么样的西方产品。这些年中国在收购西方企业或者技术方面也努力不少。但是，这里有个致命的弱点。因为收购的主体往往是大型国有企业或者受国家支持的大型企业，而且目标往往是顶端产业或者对被收购国家具有政治影响性的企业或者产业，在大多数场合，中国的收购都被政治化或者意识形态化，从而导致流产，或者收购之后效果不佳。

中国可以批评被收购国家的政治，但政治永远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大型国有企业利用庞大的资源和政府支持优势“走出去”，这可以理解。但是大型国有企业所做的并不一定是对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事情。无论是高端技术，还是资源，都是中国所需要的，但这些不能涵盖“走出去”的全部意义。对中国来说，中小企业的升级尤其具有战略意义。

这就是这里要强调的第三方面的政策，就是政府必须辅助中国的中小企业实行升级战略，无论通过“请进来”还是“走出去”途径。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发生了危机，主要表现为资金的短缺。这些企业也在寻找出路。中国如果要收购这些企业，就比较容易，因为这些企业并没有政治性，很难被政治化。老是盯着人家的大型企业不可避免要被所在国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收购中小企业也符合中国的所需。中国政府也在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中小企业的发展。这次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也是中小企业，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可以动员和组织庞大的民间和社会资本来收购中小企业。现在人们盯着的是政府的4万亿。如果能够把民间资本动员起来，就会有庞大得多的资金。

很多年来，中国庞大的民间资本因为受政府各方面的限制一直处于毫无理性的流动状态，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投资点。民间资本尽管庞大，但很分散。这就决定了政府在组织和动员民间资本方面来达成中国的中小产业的升级过程中可以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实际上，这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政府尽管已经在很努力地应对金融危机，但从上述这些方面说，政府仍然有很多并且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如果能够在多方面进行政策调整，结合政府本身和社会的力量来达成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产业升级，尤其是迫切需要的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那么在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就可以攀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同时，这对中国的经济模式的转移和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非凡的意义。（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李毅中：六举措推动产业升级仍处最困难时期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09 年会上表示，我国工业仍然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没有走出低谷。他详细阐述了推动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六大措施，并表示支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

金融危机四影响 工业增速大幅度回落

2008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影响在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回落。从去年 6 月份 16% 一路下滑到去年 12 月的 5.8%。今年 1、2 月合起来 3.8%，扣除其他方面的影响，约 5.2%。

具体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主要有三方面影响：

一是对国际市场依存度高的产业影响很大，出口萎缩，订单减少，影响企业开工率。

二是国际市场初期产品的价格高起高落，国际市场原材料的价格剧烈波动，原油、钢材、铜、铝以及石化产品出现了大幅度跌落。三是一些行业产业下降，出现了亏损。去年 11 月，生钢、汽车、乙烯等产列分别同比下降了 12.4%、15.9%、12.2%，工业用电下降 7.5%。

四是一批中小企业和部分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库存增加、资金短缺，停产、限产、歇业乃至关闭的面积在扩大。去年年底统计，去年这类企业停产、歇业关闭占 7.5%。

四举措改变工业发展困难局面

为了尽快改变工业发展的困难局面，中国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落实以下几项措施：

一是落实已经确定的各项措施，比如稳定出口、拉动消费、提高轻纺、基建等产品的出口退税，“家电下乡”、“农机下乡”、“汽车农机具下乡”，扩大工业产品的销售。

二是抓好钢铁、汽车、石化、纺织、有色金属等九个重点工业行业，加上物流业，调整

规划落实。重点对薄弱环节进行改造，主要采用贷款贴息的办法。主要部门加强中小企业适时会同有关部门，改善中小企业的管理服务，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三是大力推进企业的技术改造。利用技术改造，技术新、投资省、工期短、见效快、效益好的特点，重点在品种质量、节能降耗、环境保护、装备水平和安全生产这五个薄弱环节进行改造。主要采用贷款贴息的办法，努力用好中央财政 200 亿技改专项资金，推动一批项目尽快实施。

四是会同有关部门加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缓解融资困难，落实好中央财政今年 96 亿元的中小企业发展资金，改善对中小企业的技术的管理和服务，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六措施推进产业升级 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

李毅中详细阐述了我国在推进工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六大措施：

一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支持新能源、信息、生物、医疗、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发展生产型服务业，支持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高新技术等密集型产业，改善工业投资结构，防止重复建设，淘汰落后产能。

二是促进区域经济调整，支持内地发展特色优势企业，加快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地区的改造，加强工业园区的建设。

三是推动产业组织结构调整，推进企业兼并重组，鼓励优势企业强强联合。推进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提升产业集中度，向专、特、轻方向发展，增强行业发展活力。支持优势企业并购弱势企业和落后企业，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作配套的产业服务体系。鼓励引导外商投资，符合我国产业政策发展要求的产业，支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

四是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加强自主创新、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技术含量的附加值，顺应国内外市场和特殊的需求，开发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健全服务体系，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提高经济效益。

五是推动工业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大力倡导节能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推广节能降耗技术，推动重大工业节能降耗，推动重大的工业污染城市，加强传统回收业和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淘汰落后技术和装备。六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抓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工业发展的核心因素。加快企业的自主创新、技术进步，特别要重视加强科技成果的转化，使它变为现实的生产力。李毅中认为目前有些措施已经见效。今年 1-2 月，发电量合计虽然同比下降 3.7%，汽车产业同比还在下降 1.7%，但是降幅明显减缓，2 月份汽车产量和销量超过了发达国家，初钢的产量同比增长 2.4%，钢材产量增长了 3.1%。乙烯的开工恢复了 90%。今年 1、2 月的工业增加值大体保持了 11 月、12 月的水平。但他表

示：“我国工业形势依然严峻，仍然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没有走出低谷。”(新华网 郭彩萍)

丁磊养猪开产业升级新路

前福布斯首富、现网易 CEO 丁磊先生近日宣布，他要养猪，而且数量不少，据说 1 万头。

丁磊养猪的行为，也为我们思考的一个热门问题——产业升级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过去谈产业升级，总是说如何高精尖，如何世界领先，结果升级来升级去，从喝不起牛奶到喝得上牛奶了，可惜牛奶中经常被添加了一些不该添加的东西；从吃不起肉到吃得起肉了，可惜肉中含的激素不少，让孩子们早早成熟；从没地方住到有地方住了，可惜住的房子未必能够用上一辈子，却要用一辈子时间去还债。

如果说产业升级就是让一切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贵，却越来越忽视人本身的幸福感的话，这样的产业升级必然会走到尽头。这种拉动内需的方式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所以，“丁磊养猪”至少提供了一个启发：产业升级其实不一定就是高精尖，让猪肉从催肥肉变成健康肉，也是一种产业升级；让牛奶从毒牛奶变成可以供人正常饮用的牛奶，同样是产业升级；让房子从贵得住不起到价格适中又让人住得舒服，也是一种产业升级。

丁磊从网络界跨入养猪界，恰恰说明了一点：回到以人为本，满足人最基本需求的产业升级，才是真正的产业升级，才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升级。

当然了，这种升级的成本会比原来昂贵许多，不能用催肥剂和瘦肉精，猪生产的效率会慢下来，供给会少很多，价格会升上去。而且要雇佣的人手自然比原来多不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养猪老板丁磊先生要少赚点利润，多给员工加工资，这样至少他的员工就能吃得起丁氏猪肉，也就不愁销路了。大家都这么做，所谓的内需不足自然大大缓解。(新京报)

产业升级才是根本出路

企业倒闭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原因？为此，凤凰卫视采访了东莞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梁伟浩。

曾子墨：现在有好多媒体报道，东莞有很多企业倒闭或者外迁，根本原因是什么？

梁伟浩：从 2007 年初开始，因为国家的加工贸易问题以及人民币开始升值问题，加上后来的 2007 年下半年到 2008 年《劳动合同法》实施，整个广东地区的加工贸易都有很大的困难，影响是很大的，形势也是很严峻。

曾子墨：人民币升值这一块，你们的成本大概上涨了多少？

梁伟浩：上涨 12%左右。因为我们好多原材料也在内地采购，可以说现在大部分的公司是内地的，原材料、配件、附件、附料也是在内地采购，大部分的出口产品都是内地花的钱，我们再拿钱回来，变成人民币，从过去对美元是一块美元兑 8 块 3 毛、8 块 6 毛的人民币，现在兑 6 块、6 块 7 毛，你看，影响就是那么大。

曾子墨：《劳动合同法》对你们的影响有多大？

梁伟浩：《劳动合同法》如果是全面执行的话，影响生产成本 10%左右。

【另一种声音】

邱小平：《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成本影响有限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司长邱小平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指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用工成本影响有限。

为什么一些用人单位会认为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企业用工成本大幅度增加呢？邱小平认为有两方面的成本需要具体分析：

第一，有一部分成本客观会增加，但不是法律实施带来的，比如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劳动者的报酬也要相应的增加。

第二，过去法律实施也必须支付的成本，但是因为一部分用人单位没有很好地执行法律，就没有付出相应的成本，而现在对于用人单位执行法律规定要求更严格了，就必须付出相应的成本。比如用人单位给劳动者支付社会保险费，现在按照新的法律规定，这是对过去非法行为的纠正，不能认为是劳动合同法实施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摘自新华网）

据凤凰记者调查，2005 年东莞市制造业的企业利润是 10%左右，2006 年下降到 5%左右，2007 年下降至 3%左右。到了 2008 年，部分企业的利润出现了负增长。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制造业的利润下降呢？记者专门采访了东莞市华宝鞋业的董事长张华荣。

曾子墨：这两年，很多从事传统制造业的中国企业都叫苦连天，面临着困境。华宝集团在过去这些时间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张华荣：从 2006 年开始到 2008 年上半年，很多企业有很多困难，利润下降了很多，各种困难都在企业当中体现出来了。

曾子墨：在您自己的企业中，劳动力成本增加了多少？

张华荣：原来劳动力成本在我们当中是 13%到 15%，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到 14%到 16.5%，增加了 1.5%，就是总成本的 1.5%到 2%。

曾子墨：副食品的涨价呢？

张华荣：国内的副食品涨价，我们总成本增加了 1%左右。特别是 2007 年下半年到 2008 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副食品涨价了 25%，就是油、盐、大米，还有蔬菜涨价，牵涉到我们

员工的生活。2008年6月20日起，国家发改委将汽油、柴油价格每吨提高1000元，汽油和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基准价分别由每吨5980元和5520元调整为6980元和6520元；7月1日起将全国销售电价平均每千瓦时提高2.5分。石油和电价的上涨，部分举步维艰的企业再次陷入困境。

曾子墨：在过去这一年，原材料的涨幅有多大？

张华荣：2007年上半年到2007年10月份，上涨幅度不大。2007年10月份到现在，上涨幅度比较大，不同的材料，上涨了30%到70%左右。这个压力很大。特别是2008年，很多化工材料，比如人造橡胶涨了70%，平均来讲涨了25%到80%，有的涨得比较厉害。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天然化工材料占我们材料的30%。

张华荣告诉记者，影响到他们企业发展的还有出口退税政策。2007年7月1日起，中国开始执行新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了2831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其中鞋帽等制品出口税从原来的13%下调到11%，相当于企业利润直接减少了2%。

曾子墨：你们企业的利润有多少？

张华荣：订单还是维持着原来的现状，价格不变，利润薄了。原来做鞋做得好的，有8%的利润，现在我们维持在2%到3%。有些企业3%到5%，基本上没利润了，有些企业不赚钱就垮掉了，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

曾子墨：2%、3%，这能维持企业正常的经营吗？

张华荣：这个没有办法。我们企业做大了，对企业来讲是个社会责任。几万人就业，十几万人的生活。目前是一个困境，但长期来讲，我认为，不管哪种产业，特别是我们做鞋的，鞋是生活必需品，只要有人买鞋，就有人做鞋，我们还是有信心渡过这个难关的。（凤凰网）

《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细则》全年出台时间表

《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细则》（下称《细则》）出台的具体时间表已经确定，从3月起陆续公布至今年年底。

2009年3月 出台汽车下乡专项补贴、加快老车报废更新财政补贴、清理不合理政策、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政策

从今年3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具有农村户口或户口在县级及其以下行政区域的公民，购买微型客车以及报废三轮车和低速货车换购轻（微）型载货车，均给予财政资金直接补贴，补贴比例为车价的10%，购车后两年内不得过户转让。

《取消限购汽车不合理规定》由发改委牵头制定，内容包括：各地方阻碍汽车消费，违

背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的政策法规必须于 3 月 31 日前清理；不能及时清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必须于 3 月 31 日前上报国务院，并从 4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暂停实施；不能暂停的相关政策法规同样须上报国务院。

2009 年 4 月 出台促进汽车金融发展的政策

《促进汽车金融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修改和完善汽车消费信贷制度，抓紧制订汽车消费信贷管理条例，使资信调查、信贷办理、车辆抵押、贷款担保、违约处置等汽车消费信贷全过程实现规范化、法制化。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骨干汽车生产企业建立汽车金融公司。促进汽车消费信贷模式的多元化，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规范发展，支持汽车金融公司发行金融债券等。

2009 年 6 月 出台鼓励新能源车消费的政策

国家将拿出 200 亿元补贴投向新能源汽车，支持大中城市推广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优先在城市公交、出租、公务、环卫、邮政、机场等领域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2009 年至 2011 年，提升新能源汽车销量占乘用车销售总量至 5% 左右。

2009 年 7 月 组织制订促进汽车生产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措施

2009 年 10 月 制订基于车辆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的税收奖罚办法

将按照车辆油耗标准征税，以加快高油耗车型退出市场以及减少或停止使用。这将有利于扶持低油耗、节能减排车型的市场快速发展，形成汽车市场的逐步转型。

2009 年 12 月 制订汽车消费信贷管理条例、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政府计划将于 2009 年 12 月推出新能源汽车基础建设规划，建立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网络，加快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公用充电设施建设。

●八面来风

五大城市圈价值报告：深圳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居首

4 月 29 日，国内首家在香港上市的咨询公司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迪顾问”)发布“2008-2009 年五大城市圈城市投资价值研究报告”(下称《报告》)，重点评估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地区五大重要城市圈，深度扫描了 55 座重点城市的投资价值。其中，深圳、上海、北京、武汉、长沙五座城市的综合投资价值指数分别居上述五大城市圈之首。

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转型需求增强

经过若干年的发展，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报告》显示，从投资价值综合指标分析来看，深圳、广州在本地区的投资价值居首位，佛山市、东莞市作为第二梯队，在增长量上表现明显。这四个城市工业增加值合计占到地区工业增加值的近 80%；在珠三角所辖九城市中，珠海市工业发展水平不高，投资价值未充分表现。

“但若从三次产业来看，该地区的重工业在全国没有绝对优势，仅深圳市重工业占比超过全国平均值。”赛迪顾问城市战略咨询中心总经理秦海林博士对记者说。为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新一轮产业升级转型的大势下，珠三角经济必须“再行一步”：首先，依靠原有信息产业的实力做大做强自主创新产业，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同时，根据日本、美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重化工业向沿海转移的世界性趋势，中国也出现了重化工业向沿海集聚的趋势，这给珠三角地区的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机遇。其次，珠三角地区作为香港经济腹地，具备承接香港高端现代服务业转移的地缘优势和产业基础，可以进一步深化粤港合作，通过珠三角等地置换产业空间，积极培植和承接香港现代服务业。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服务业投资最具潜力

《报告》发现目前长三角地区已经发展到后工业化时期，两省一市的 GDP 总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 20%，三次产业结构为 2.75：52.38：44.87，比较先进。

秦海林向记者介绍，该地区的重点优势产业可分为两大方阵，一是传统优势产业，包括装备制造业、纺织服装业和旅游业；二是前沿引导产业，包括重化工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通过多因素综合评价，上海市在长三角显示出最好的投资价值，苏州、杭州、南京的综合竞争优势明显，宁波和无锡也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绍兴、常州、湖州、嘉兴等城市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在增长量上表现较好，在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参与长三角分工体系的格局下，投资价值也日益提升。

环渤海地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

“尽管在 2008 年环渤海整体经济增速稍有放缓，但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而言，环渤海区域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各省市不乏一些增长亮点出现。”秦海林说。

《报告》从产业结构分析入手，将环渤海地区产业发展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北京市为产业发展高级阶段，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高达 71.4%；第二层次为天津与辽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重发展；第三层次为河北和山东，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比重有待进一步提高。

环渤海区域第三产业的相对落后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这些新兴服务业的落后。这些新兴服务业一般高度依附于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因此环渤

海区域新兴服务业的繁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天津、沈阳、大连、青岛等几个中心城市的发展状况。

长株潭城市群：新兴产业正着力培育

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以及岳阳、常德、益阳、娄底、衡阳八个城市，其东承长三角，南连珠三角，西启成渝，北接武汉城市圈。

《报告》认为该城市群综合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但由于八大城市之间发展差异较大，整体判断长株潭城市群处在工业化阶段初期以传统工业部门为主。新兴部门正在着力培育发展，产业结构相似与互补并存，但产业关联性不强，产业链发育水平不高，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小，竞争力有待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外援乏力。

在重点发展的产业类型及产业发展总体评价方面，秦海林建议可发展如下优势产业及产业集群：一是汽车及其配件制造产业集群，形成一批品牌企业；二是机械装备制造；三是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四是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五是以中药现代化为基础的产业集群及新兴现代制造产业集群；六是文化产业集群；七是物流产业集群。

武汉城市圈：强市弱圈中心城市投资价值明显高于其他

《报告》认为与其他四大城市圈相比，武汉城市圈具有明显的“强市弱圈”特征，即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还有着明显的“大项目、大配套、大企业”带动的特点。比如从产业集群来看，汽车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子设备制造业都在圈中占有较高比重。另外，黄石、孝感等市发展势头较为强劲，五年 GDP 平均增速超过全国总体水平。秦海林建议，针对武汉城市圈强市弱圈的现状，应迅速从行政主导过渡到以市场主导，加强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参考报》陈圣莉）

长三角打响海归人才争夺战

一架无人驾驶的直升飞机在无锡太湖边盘旋，遥控者是沈建平。

这种长 2 米多，起飞重量近 40 公斤的无人驾驶直升机，由沈率领的团队自行研制成功，能广泛运用在航拍、遥感、气象甚至军事领域。

沈建平是上海人，曾在日本工作了 20 多年，而现在的他，选择在无锡太湖边的一块空旷草地上，经常仰望自己的直升飞机翱翔。

“等到我们的直升机成功量产后，其它地方的政府会因为没注意到这个项目而感到懊悔。”沈建平认为，江苏省无锡市为自己提供了更好的创业环境。而在上海，严格的领空控制让他们的飞行试验只能处在秘密的状态。

沈建平的公司无锡甫一落地，就得到了 100 万的无偿资金支持，无锡市政府控股的两家风险投资基金还为其提供了 300 万元的风险投资。

此外，由无锡市政府免费提供的 400 平米办公场地正在紧张地装修，就连装修费也是当地政府免费提供的。在这组漂亮的科技楼群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办公室迎来了新主人。楼下新建的篮球场和咖啡厅，正吸引着从上海赶来面试的工科毕业生驻足。

类似的创业故事正在长三角各地频繁上演。最近一段时间，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和苏州市委书记王荣都亲赴欧、美、日等地寻找更多的创业型海归人才。而金融危机的到来，明显加快了各地政府对领军型科技创业人才的争夺。

在长三角地区人才争夺的背后，是各地方政府综合实力的现实比拼。一场新的竞赛，已经开始起跑。

为什么是无锡

沈氏兄弟的无人驾驶直升飞机其实在上海已经秘密研制近 3 年，然而从今年年初开始，沈建平的名片开始印上了“无锡”二字。

“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沈的哥哥沈建文告诉记者，在过去很多年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施严格的技术封锁，因为这种无人驾驶直升机有可能被用于军事领域，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处于空白。

哥哥沈建文的公司已经在上海经营多年，有一定的资金积累。此后的几年间，凭着满腔热情，沈氏兄弟终于在最关键的飞机控制技术上取得突破，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

2008 年 6 月的一天，还在日本工作的弟弟沈建平无意间参加了无锡市的人才推介会，了解到无锡有一个叫作“530”的海外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即在 5 年内吸引 30 名领军型海外创业人才。

“我们当即就被这个计划打动了，毕竟这样优惠的条件之前很少听到。”身在日本的沈建平与无锡政府一拍即合。但真正让沈氏兄弟决定将整个项目迁往无锡，还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锡一位官员多次前往上海考察沈氏兄弟的实验室。此后，沈氏兄弟向无锡方面递交了一份详细的创业计划书，年底的时候，沈的项目被专家评为 530 计划的 A 类项目。

让沈氏兄弟印象最深刻的是，该官员竟然带着他们到无锡市区去租房，一家一家地找——当地政府每月还提供 3000 元的租房费。“我感到他们是踏踏实实想做点事情。”沈建文说。2008 年 11 月，沈氏兄弟的公司终于落户无锡，注册成立了“无锡汉和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沈氏兄弟投入 200 万元自有资金，加上无锡政府一次性给予的 100 万资金，以及当地政府控股的 300 万风险投资基金，形成了最初的启动资金。沈氏兄弟表示，这种无人驾驶直升飞机，将会以中国市场可以接受的价格很快面世，预期利润十分可观。

复制尚德模式

种种迹象表明，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长三角各地对要素资源的争夺，已经由招商引资逐步过渡到招才引智。以无锡为例，在实施“530”计划三年以来，共有 276 名企业家通过该项目注册落户无锡。仅 2008 年注册落户的就有 208 家，比 2007 年增长了 2.4 倍。

尚德公司落户无锡并最终海外上市的故事，在长三角已广为人知。而以无锡尚德为蓝本的人才引进模式，正在成为长三角引进人才争相效仿的对象，其核心便是政府作为投资者介入科技创业者的早期项目，并在企业将要成功时适时退出。

“尚德的成功让我们看到了政府对创业企业的保护，不与民争利，这是我们决定来无锡创业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无锡一家太阳能企业的总经理告诉记者，尚德的成功在海归技术人才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尚德成功的过程当中，地方政府扮演了很好的投资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在落户无锡之前，我们已经与上海多家民间风投公司谈过。”无锡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表示，“对方承诺投资 500 万，但往往并不是一次到位，可能先投几十万，逐步获取创业团队的核心技术，然后逐步把创业团队洗出去。”这个董事长指出，类似的事情在科技创业界已经不止一次发生。

由于创业者与民间风投基金之间存在天然的利益争夺关系，因此，在和众多民间风投资金谈判时，创业者通常慎之又慎。“相比之下，政府主导的风投基金让我们十分放心，因为他们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该董事长表示。在更深层意义上，对于无锡等急需转型的长三角二线城市来说，大力推广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已是形势所迫：

随着土地资源的日趋紧张，苏南地区的外商投资增速也开始放缓，过去十多年间苏南赖以生存的招商引资模式面临着现实的考验。无锡市多位官员均向记者坦陈：当地“530”人才引进计划的受重视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招商引资。

一个直观的表现是，有关 530 计划的大小活动，总能见到无锡市委书记杨卫泽的身影。近一段时间以来，杨更是多次带队远赴欧美招揽人才。“打造科技创业家的摇篮城市”——已经成为无锡最重要的转型战略之一。无锡某区委组织部长告诉记者，自 530 计划实施后，领军型创业人才的引进已被列入各区县官员的考核指标。无锡各区县每年均有一定的创业人才引进任务需要完成，各级政府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人才大战揭幕

沈氏兄弟的直升机项目在落户无锡之后，很快引起了其他地方政府的关注。“无锡给 100 万启动资金，别的地方政府就马上就跑过来，说给我们 200 万，要我们搬过去。”沈建文说。

“也许我们搬到上海、苏州、南京等地也会成功，但作为创业企业，我们不会想这么多。”沈建文指出，良好的政府服务往往比多 100 万启动资金更加重要。无锡一位负责 530 项目的

官员告诉记者，在无锡的 530 计划推出后不到一个月，苏州市便派来一个由副市长带队的庞大考察团，全面“学习无锡在人才引进上的经验”。在最近的几年间，已先后有 30 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来到无锡。

而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在与无锡的竞争中同样不甘示弱。比如湖州推出了“南太湖精英计划”，苏州推出了“姑苏创新创业领军人才计划”，常州推出了“千名海外人才集聚工程”...一场人才引进大战，在长三角已摆开阵势。然而海归创业者的批量引进，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课题。政府服务水平的高低，也许将直接决定人才引进大战的胜负。

“和招商引资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才引进是一个见效相对较慢的过程。目前各区县对人才引进更多的是不停地财政投入。”无锡某区委组织部长告诉记者，在很大程度上，人才引进拼的是地方政府的财力。例如，无锡市政府甚至在内部明确表示，对于有市场前景的创业型科技企业，“要不计成本地投入，有一家扶持一家”。

无锡在人才引进方面的大手笔投入，得益于多年积累的雄厚财力，但对于一些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这样的投入显然需要冒一定的风险。“目前无锡获得创业投资的企业，成功概率不到 10%。并不是每个企业拿了钱都在真正做事情。”一家 530 计划的企业老板告诉记者。

而如何对海归创业者进行有效把关，也成为长三角各地政府的重要挑战。无锡人事局方面表示，能否实现产业化，是当地政府用来衡量创业企业是否成功的最重要标准。但众多创业者反映，高科技产业的特性决定了产业化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需要当地政府耐心地等待和一如既往地服务。（《21 世纪经济报道》曾航）

深圳将启动“行政权三分” 逐步取消区级政府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是深圳“行政权三分”改革最初的设计者之一。他回忆称，2003 年深圳市在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其即将成为中国惟一推行“行政权三分”试点改革的城市。

6 年前改革无果而终

由于规划中决策部门的级别较高，其数量也“越协商越多”。最终的方案已经不再是当初意义上的“行政三分”，改革也就此沉寂。

马敬仁说，按照当时的思路，深圳将对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曾解释三大板块的定位分别为“决策局只有决策权而没有执行权；而执行局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监察局和审计局将作为监督部门直属市长

管辖。”

这一既符合如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经验、也符合十六大报告中“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原则的改革思路却在披露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而更大的阻力则在于，改革思路几乎是将现有的政府架构推倒重来，深圳市政府的协调工作复杂而难以推进。改革的另一设计者、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回忆，如果按照最初的思路，至少有五分之一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这无疑会带来人事安排的巨大障碍。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于5月初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其所涉及的数项改革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列为首位。

一个明确的信号是，深圳在2003年大张旗鼓开始却又悄无声息流产的“行政权三分”改革，即将重启。

“行政权三分”，是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这是改革期望达到的目的。但实际操作上将会面临机构撤并、部门定级等阻力。

作为继滨海新区、浦东新区之后的中国第三个全国性综合改革配套区，《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已于5月初获国务院正式批复。

这一《方案》从年初深圳市正式递交至批复历时不到半年，与前两个综改区的漫长等待不可同日而语，堪称“深圳速度”。

《方案》的操刀者，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蒙敬杭日前对本报记者确认，深圳已定于本周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正式公布《方案》全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居首

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决策部门、执行部门、监督部门三大板块，各自运行。

在《方案》涉及的数项改革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被列为首位。在《方案》涉及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延续了之前《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中的表述，即“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在政府机构设置中率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机构撤并将在所难免

细则尚在制订当中，“现在还并没有定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有政府架构将被再次打破，机构的撤并也在所难免。

时间来到6年之后，大部制改革在中央层面全面铺开，部委的大工业、大卫生、大交通

格局已初见雏形，深圳重启改革的时机也已经成熟。

乐正分析称，深圳无疑是全国最有条件率先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分”的城市，“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特区，深圳是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最为完善的地区，这必然会反映到政治层面。另一方面，经过多次机构改革和试探，深圳市政府和公众对于大部制都已经并不陌生，这也是中央会这么快对深圳递交的方案进行批复的原因。”

据本报记者了解，在《方案》公布后不久，深圳将会出台一个针对《方案》的三年工作规划，而其包含的各项改革则会根据项目陆续推出配套细则，当中就涉及备受关注的大部制改革究竟如何操作。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倪星向本报记者回忆，去年年中其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中听到深圳市编办的相关人员介绍思路，“主要方向是市长层面仅设置一正一副，其他副市长则各自牵头成立决策委员会，下面再设置各个执行局，而将现有的监察局和审计局等合并成立监察委员会。”

但是这一思路究竟是否是最后方案尚存疑问，马敬仁认为这只是“方案之一”，乐正也强调配套细则尚在制订当中，“现在还并没有定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现有政府架构将被再次打破，机构的撤并也在所难免，“我们会分流一部分人，再自然精简一部分”。乐正说。

机构如何定级成为阻力

理想中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应为合同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本次改革很有可能将按照决策、执行、监督平级的模式来推进。

本报接触的各方人士均认为，深圳重启“行政三分”的改革最大阻力，依然在于机构的数目以及定级。

马敬仁分析称，从上次经验来看，决策部门想要实现一步到位的剧减已基本不可能，“现在有 21 个部门，我们可以先微调，比如调到 15 个到 18 个，下面再设置相应的执行局，这样改革的阻力最小，也可以渐进达到目标”。这些部门将按照大行业大系统的原则来进行运作，“比如发展与改革局是典型的纯决策部门，

再比如规划国土系统，规划属于决策局，而住宅和国土就肯定属于执行。”

三大类部门的“定级”则存在一定悖论。倪星解释称，“毫无疑问如果决策部门的行政级别较高，会比较有利于协调，但是这样又会增加阻力，比如执行部门的局长就会想，为什么我比决策局的局长要低半级或者一级？”

乐正透露，为了避免上次改革的历程重演，深圳本次改革很有可能将按照决策、执行、监督平级的模式来推进，“如果职能分工够明确，就不会存在决策指挥不动执行的问题。”马敬仁则认为，理想中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应为合同关系，而非上下级关系，“每年执行局要给决

策局签订行政合同，当中就规定了今年的任务，然后监察局再按照合同的完成情况来考察绩效。”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曾用改革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来形容机构改革的复杂性。马敬仁也说，深圳的改革不可能一步达到外界的期望，“中央给深圳先行先试权，也正是探索一条可行的路径，而非寄希望于一蹴而就”。

■ 延展

改变 1 逐步取消区政府

多位相关人士还对本报记者确认，在《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明确深圳将“探索城市行政区划及管理体制上改革”，即“适当调整行政区划，推进精简行政层级改革试点，实现一级政府三级管理，创新现代城市管理模式”。

现有中国城市的行政层次均为“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即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社区，前两者为行政政府，后两级则为政府派出机构。根据规划，深圳将逐步取消区政府，将其也改为政府派出机构。

对于撤销区级政府带来的人事变动，本报记者所接触的人士均未正面回应。如乐正就表示，“区长们依然会工作，级别不会发生改变，只是名号可能有所不同”。马敬仁则透露，按照现有部署，深圳将采取“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作为过渡模式，即将街道办和社区合并管理。

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曾表示，深圳将通过为期 5 年的改革，到 2013 年建立全新的公共服务型政府，这一时间表比全国目标提前 7 年。

改变 2 特区覆盖“关内外”

此外，《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中还提及将“深圳经济特区”覆盖整个深圳行政区划，这意味着在深圳持续 20 年的“一市两法”局面将会改变。深圳人习惯用“关内”“关外”区分是否为深圳经济特区。“关内”包括罗湖区、福田区、南山区、盐田区，“关外”则包括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目前深圳市人大通过的所有涉及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均只适用于“关内”。乐正表示，这一现象虽然在现实中已经逐步被突破，但关内外的划分依然给深圳发展带来了制度性的障碍。

乐正还透露，虽然将“关外”划为特区在方案中有所涉及，“但是这个不是短期的问题，不会很快实现。”（《新京报》李静睿 南山）

诺奖得主克鲁格曼：仍应对经济前景保持谨慎

现在还不是庆贺的时候，我们仍应对经济前景保持谨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看到了经济复苏的“新芽”。奥巴马总统看到了“几缕希望之光”。近来的股市俨然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那么，是否到了解除警报的时候了？以下这4条，是我们应该对于经济前景保持谨慎的理由。

1. 经济形势依然持续恶化。工业生产刚刚跌入10年来最低谷。新房开工率依然萎靡。有所缓和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现象，如今又再次猛增。

我们能够说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稀疏的迹象表明，经济形势恶化的速度逐渐放慢——也就是说，经济猛跌的幅度不像过去那么大了。请注意，我指的是一些“稀疏的”迹象：最新一期的褐皮书显示，“12个区域中有5个区域，出现了经济下降程度缓和的迹象。”

2. 有些好消息缺乏说服力。近来，最大的正面新闻来自银行业。许多银行宣布，它们的收益好得出乎意料。但是，其中的一些收益报告看起来有点……滑稽。

比如，富国银行公布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季度收益。但是，银行报表中的收益并不是类似销售额这样的“硬数据”。这些收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拨备的，用来弥补预期未来贷款损失的资金额度。一些分析师对富国银行的假定和其他的一些会计问题，深表疑虑。

与此同时，高盛公司宣布，它2009财年第一季度的利润，较2008财年的第四季度，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正如分析师迅速指出的那样，高盛改变了“季度”的定义(这是对其法律地位的变化作出的反应)，结果就是，这家投行数据糟糕的12月份，从这项比对中消失了，的确如此，我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在这一问题上，我不想说得太过火。或许有些银行真得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惨重的损失转化为丰厚的利润。但是，在这样一个“盛产”麦道夫的时代中，以疑虑的眼光看待一切，是很自然的事情。

请那些指望财政部的“负荷测试”会将一切说清楚的人士，注意一下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勃斯的言论：“你将以一种系统的、协调的方式看到，决定并向所有相关方显示这些负荷测试结果的过程是透明的。”不，我也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3. 或许还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尚未降临。即便在“大萧条”时期，经济形势也并非一路急转直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危机爆发大约一年半之后——大体相当于我们目前的处境——出现了一段停顿期。随后，大西洋两岸爆发了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与之相伴的是，各国政府

为了竭力捍卫奄奄一息的金本位制，出台了一些灾难性的政策措施，接着，世界经济又坠入了另一个深渊。

这种情形还会重演吗？商业性房地产正在分崩离析，而信用卡损失也呈现出激增之势，没有人知道日本和东欧的经济局势会变得多么糟糕。我们或许不会重复 1931 年的灾难，但我们根本无从确定，最恶劣的部分业已结束。

4. 即使当它过去了，也并不意味着危机彻底结束。按照官方的说法，2001 年的衰退仅仅延续了 8 个月，在那年的 11 月份便结束了。但在随后的一年半中，失业率持续攀升。在 1990 年至 1991 年的那场衰退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因此，我们有一万个理由相信，这样的情形会再度发生。如果失业率上升的态势延续至 2010 年，请不要惊讶。

为什么呢？只有当经济体中存在大量被抑制的需求时，就业人数大幅回升的“V 形”复苏才会出现。譬如，1982 年，在高利率的打压下，房市一片哀嚎。因此，在美联储放松利率之后，住宅销售量便开始猛增。这次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宽泛地说，当下经济萎靡不振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债台高筑，美国建造了太多的大型商场，这年头，谁还有兴致再一次肆无忌惮地花费？就业人数最终会复苏——历来如此。但是，这种复苏是不可能很快出现的。（《财富时报》）

周其仁：景气低迷中的企业家行为决定经济增长

景气低迷，是目前许多厂家面对的一个现实。本文试图提出，企业和企业家在景气低迷时期的行为，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样的题目从何谈起？我想还是先从几个故事开始。故事里面大有学问

第一个故事是冰箱的门

冰箱原来都有个门把——鼓出来的那么一个物件。但是你现在到商场里看，大部分冰箱的门都是“暗开”的了，就是没有门把了，只是在门的上边，开一道暗槽。这当然不是什么太大不了的发明创造。但是，对于住房面积比较小的许多中国家庭来讲，这个小小的改进有其功效。因为许多家庭希望冰箱有装饰功能，放在那里比较好看一点。没有门把的冰箱门，可以满足这么一点需要。事后来看，这件事平淡之至。但是对于第一个做出没有门把的冰箱的工厂来讲，就不简单。生产线要改，模具要改，其他设备要改，工人习惯的生产工艺和流程也要改。

那么，谁在中国第一个生产出没有门把的冰箱来的呢？是科龙。据科龙集团主管技术的陈福兴副总裁讲。

什么时间？1988年至1989年。

为什么在那个时间？因为不景气。冰箱生产“过剩”，要竞争图存，不拿出点新的东西，商场和顾客如何会买你的账？

你听，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意思了？企业为了对付不景气，加快了创新活动。你再问下去，果然就是科龙的一条发展线索。冰箱的门可以两边开，第一个也是科龙在国内生产出来的。门可以两边开，冰箱在房间里的摆法就多了。冰箱可以就着房间，而不是房间必须就着冰箱。什么时候搞出来的呢？就是前两年业内人士普遍抱怨宏观调控把经济调下来的时候。去年以来，市场更“冷”了。科龙的产品可就更“花”了。他们率先引进“热转印”技术，在冰箱门体上压膜制成大面积图案，高温成型，永不脱落。冰箱的装饰性更强了。

这只是讲了一扇冰箱的门。创新的背后是投资、技术改造和管理。

科龙的轨迹非常有意思：每逢景气低迷就大手笔投资。当年科龙在成都收购成都发动机厂的一个车间，在西南建起一个冰箱生产基地。一家伙投入 2.5 亿元现金，把原来整个车间推倒。潘宁（原科龙老总）的理念是：市场低迷，大家难过，我扩大规模，提高竞争门槛，等到下个市场高潮来到时，科龙已经准备好了。你总不能说，等市场热点来的时候，你才去推倒车间建生产线吧？

潘宁讲的这一条，不是什么点子大王的秘诀，但就是很难做到。就是把这个方子告诉天下所有老总，也不是个个都可以照做的。在景气低迷时大投资，你要有多么雄厚的实力、多么稳健的财务基础和多么好的信用？这样讲起来，后面的学问就大了。

第二个故事是酒

中国人早就知道“酒是陈的香”。但是，消费者买到的酒，究竟有多“陈”，从来没有成为我们这样一个酿酒大国里酒品的一个卖点。欧洲的酒不但“越陈越香”，而且“越陈越贵”。人家把酒的年头标在酒牌上了，多一个年头多一分价钱。当然，现在国内也有标明陈酒年份的酒品了。

第一个标明酒年份的是谁？

据我所知，是古井贡酒(行情 股吧)。市场上有“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等，年代不同，价钱不同，越陈越贵。

什么时候有此“创新”的呢？

1989年，市场低谷，连古井贡酒都不好卖时。从此消费者可以喝到不同年份的陈酒，多了一种口福，厂家多了一个卖点，增加了突破景气低迷的力量。

与此类似的还有上海两家很有名的超市，在国内第一个改变了跟供货商的合约模式。原来流行的是所谓代销制，就是你厂家的东西放到我这里来卖，商家只是代销，要是卖不掉，

对不起了，你负担吧。但是这样一来，厂家对商家怎么可能一心？等到市场热起来时，商家竞争加剧，厂家就可以拿一把，轮到他做大爷了。如此循环，家家得到平均利润（或者平均没利润），谁可以出得了头？上海的这两家超市“逆向”而动：偏偏在市道最不好的时候，主动跟上千个商品品质好的厂家签订了买断性合同——就是商家把产品买断，卖不出我承担风险。在低潮的时候这样结成的联盟，到商业高潮来的时候就非常可靠。这也是景气低迷时投资的故事。

第三个故事是“永和豆浆大王”

这是一家台湾食家的连锁店，把豆浆、油条、小笼包、牛肉面这样的小生意，从台湾地区做到了美国。你在洛杉矶中国城“永和”的铺子里，可以喝到地道的中国豆浆。几年前，“永和”进军内地。北京海淀区三环路边上开了一家，墙上写的是“中国第 26 家”，卖的无非是早先上海路边摊摊上的早点，但你看人家那个红火。就是在现在，市道不景气到了顶点，多少大小饭馆酒楼门可罗雀，永和豆浆的门店依然爆满。“永和”一个卖豆浆的，绝没有什么“高科技”，冬天能把冰激凌卖得如此火爆，到了夏天还怕什么呢？

景气低迷另外产生的故事就不像上面的几个那么美妙。许多企业现在不是什么创新问题，更不是什么投资，而是活得下去与否的问题。关闭、合并、重组，工人下岗、老总下台、公司换旗，这些都不是好事，需要政府谨慎对待。但是，事情也有另一面。景气低迷是完成市场重整和企业重组的良机。市场出清劣质公司，多半在景气低迷之时。所谓竞争优胜劣汰，多半不在景气高扬的时候。试想，无论谁的东西都好卖，萝卜快了不洗泥，你说谁“劣”谁“优”？但是，一个经济要是没有优胜劣汰，产品如何更新换代？经济结构如何优化？经营活动的质量如何提高？

所以，市道越低迷，企业越两极分化。憋到一定时候，该淘汰的淘汰，该重组的重组，该兼并的兼并。要是日日景气，“六亿神州尽尧舜”，海尔到哪里去吃“休克鱼”，科龙又在何处精挑“生猛海鲜”呢？

经济萧条的正面功能

上面的故事都平常，谁也看得见。但是，联想到经济增长，我们对市场不景气的认识恐怕也要“重组”。过去讲经济萧条和危机，只有灾难的一面。政策上就是如何调节景气，防止损害。原来以为经济波动只与“资本主义制度”有关，计划经济则可以消除景气循环，至少可以主动调整加以避免。现在反过来，大家认定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成功调节景气，值得中国人学上三招两式。无论怎么 180 度地翻转运动，就是不能面对景气波动在古今中外都消除不了的现实（否则奈特的“不确定性”概念，怎么可以“活”到今天）。至于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功能”，更被看做奇谈怪论。

但是，经济萧条对经济增长的确有“正面功能”。妨碍我们看到这一点的，除了利益的原因，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推理。比如，“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分类。依我之见，这个分类之所以没有道理，在于它假设市场里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一样的。1989年，没标陈酒年份的古井卖不动，“五年古井”和“十年古井”买不到，问：古井贡酒是不是买方市场？1995年，单向开门的冰箱过剩，双向开门的冰箱短缺，问：冰箱是不是卖方市场？1998年，一般饭馆过剩，“永和豆浆店”短缺(否则为什么老是排队)，问：饮食业是什么市场？三问下来，自知讲不清楚何谓买方市场、卖方市场。讲不清楚的原因，是分类概念本身有问题。冰箱、酒和吃食，每一个时期，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都同时存在，某一品种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过剩”了，另一种或多种同时“不足”。推广开来，人类的衣、食、住、行、用，无不如此。在最不景气的时候，也存在着“卖方市场”，否则怎么会有经济增长？企业家不断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这就是企业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就是不断通过创新来制造“卖方市场”。这样的“卖方市场”多了，景气低迷就走出来了。

进一步要讲景气低迷对经济增长有所“贡献”，不免显得突兀。但景气低迷导致的重组和创新活动密集，驱动经济增长沿着结构更新、品质提高和技术、组织创新的路径前进，恐怕是经济生活中不争的事实。

这里有两种机制。一是商业低潮大大降低了企业组织在市场环境里“存活”的临界值，客观上会把在经济高潮时难免带来的滥竽充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列入“淘汰名单”。二是低潮时期商业世界激烈竞争的冷酷现实，会以“不创新就是死亡”的压力逼迫企业家发挥潜力。结果，“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景气低迷、难度非常高的时候，市场越可以识别出优秀企业家。从上面几个故事可以看出，很多出奇制胜的动作是景气低迷时完成的。最重要的学习是这个时候进行的，因为在这个时候逼得你非学不可。现在全球讨论东南亚经济危机，人们热衷于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似乎被忽略了：那些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中国的)，在急速的亚洲危机之中究竟如何应对？如何调整战略战术？如何创新图存的呢？(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商界评论》)

●小百科

什么是产业升级？

所谓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

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为产业的协调发展和结构的提升；

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以及产品质量的提高。

产业升级的成本

第一类成本多是建设性成本。企业可以将其作为投资而在将来的经营中分期摊销，政府也愿意在这一部分加大投入，在某种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下，国家部署的转型性投资将大部分集中于此，所以虽然这一部分的资金可能所需规模最大，但从结果看却是最有保证的；

第二类成本可以归类为先行成本。它更多的表现为损失，它的付出不会带来现实的生产力提高，所以这一类成本是企业不愿意付出、而政府也趋于回避的，目前产业升级虽声势浩大，但就是囿于前期成本问题难以前行。

第三类成本容易被人们所忽视，产业升级必然带来劳动生产力提高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由于人类生理条件的限制，人的转型比产业更加困难，部分劳动力向农业的回归是必然的，农业生产率可能会成为工业升级的牺牲品，其涉及到的补贴规模将更为惊人。